

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2 038 0804 0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

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1949—1979)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1.25印张 1,009,000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600

书号11002·567 定价(上下册)4.05元

目 录

前 言	章开沅 (1)
辛亥革命	吴玉章 (11)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	黎 澍 (28)
辛亥革命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丁日初 (48)
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	章开沅 刘望龄 (60)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李时岳 (103)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邵循正 (119)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	赵 亲 (134)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	陈庆华 (159)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人	何玉畴 (168)
清末立宪派的阶级基础问题	苑书义 (197)
论諮议局	韦庆远 高 放 刘文源 (210)
华侨与辛亥革命	孙 健 (231)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华侨中的 斗争	段云章 谭筱岸 黄冠炎 (255)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陈旭麓 劳绍华 (279)
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刘大年 (297)
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林家有 (312)
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	吴乾兑 (331)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林增平	(352)
光复会性质探讨·····	罗耀九	(366)
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	沈 寂	(387)
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章开沅	(402)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杨天石 王学庄	(425)
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沈渭滨	(464)
试论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的武装		
斗争·····	王志光 卞柏林 符祥刚	(477)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	陈锡祺	(495)
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暗杀活动·····	戴学稷	(51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农民斗争的几个问题·····	乔志强	(527)
论清末的铁路风潮·····	祁龙威	(550)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	林增平 石振刚	(594)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	隗瀛涛	(636)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从保路到独立的经过·····	何重仁	(649)
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	章开沅 陈祚津 陈 辉	(691)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政权斗争·····	李时岳	(717)
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	李玉奇 张 磊	(728)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革命运动·····	莫中一	(749)
辛亥革命在福建·····	陈孔立 蔡如金 杨国楨	(758)
辛亥革命在上海·····	徐 仑	(781)
略论辛亥时期河南的革命运动·····	王天笑	(788)
山西辛亥革命·····	江 地	(803)
武昌起义前后天津和直隶的革命形势与革命		
斗争·····	闻性真 陈瑞芳 高 平	(814)
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李时岳	(824)

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	戴学稷 (846)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赵矢元 (872)
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	陈胜舜 (885)
辛亥革命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所提供的历史 经验	张晋藩 邱远猷 (915)

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	金冲及 胡绳武 (929)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	黄 彦 (943)
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	肖致治 (955)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李泽厚 (969)
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李光灿 (994)
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张 磊 (1011)
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理想	段云章 (1070)
论清末革命党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	夏东元 (1093)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陈锡祺 (1115)
论黄兴	金冲及 胡绳武 (1148)
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	章开沅 (1175)
论宋教仁	陈旭麓 (1182)
章太炎是什么派?	李润苍 (1201)
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学术思想评价	汤志钧 (1226)
鲁迅与辛亥革命	李 侃 (1244)

兴中会创立的时间和地址考	荣孟源 (1257)
--------------------	------------

附录：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	(1263)
编后说明	(1314)

前 言

章 开 沅

按照传统的说法，三十年为一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的分枝，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样，也只不过经历了一“世”的发展过程。

全国解放前，除个别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做过稍为系统的研究以外，辛亥革命史主要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御用学者所垄断。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章，其中虽然提供了某些可用的资料，但大多属于或接近于宣扬反动正统观念的官方读物，真正谈得上有些学术价值者寥寥无几。

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开始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三十年来，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五十余种，资料三十余种，论文六百余篇（不包括纪念性文字和回忆录）。应该强调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的《辛亥革命》一至八册和《民报》影印本等重要资料的相继出版，一九六一年以后全国政协主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至六集和各省（自治区）、市、县的专题性回忆录及资料的陆续刊行，特别是有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亲自参加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辛亥革命

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问世,对于这门年轻的学科都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人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以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在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纲领,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张謇等历史人物,新军和会党,辛亥革命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各地规模较大的群众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等等方面,都取得了虽说是初步但毕竟是可喜的进展。人们完全有理由期望,日渐兴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六十年代之内能够出现一次较大的突破。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推行的极左路线的破坏干扰,辛亥革命史和整个历史学以至全部社会科学一样,正常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本来就比较年轻而又为数不多的研究队伍也遭到严重的摧残。一九七四年以后,辛亥革命史更被“四人帮”纳入所谓“儒法斗争”的框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只是在一九七六年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才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中断十年以上的研究工作才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三年以来,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辛亥革命史论文日渐增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盛宣怀等正反面重要人物的全集、选集、年谱、传记、年谱长编、档案汇编正在编撰和陆续刊行,还有若干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专著即将先后问世。中南地区和西南各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建立,不仅说明辛亥革命史队伍较之过去有所发展,而且还说明各地的研究工作者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协作和联系。一九七九年冬天,由中山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广东

省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行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行当来说，仿佛是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人们热切的期望，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将在八十年代出现一片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繁荣景象。

本书选编的六十余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非常需要而且也必定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这个领域的流毒，至今仍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首先，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解除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对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当然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即使是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必须透过它“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深入地剖析其狭隘的阶级内容；^①特别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阶级实质，注意把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严格区别开来。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批”字来概括对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全面评价，更不意味着可以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抹煞资产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4页。

级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愤怒声讨资产阶级的战斗檄文。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恰好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明确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样，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这篇重要著作中，也辛辣地嘲讽过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请注意，在这里，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毫不含糊的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这样看来，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除了批判的一面，还有继承的一面，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批判地继承。

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有它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这种发展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这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大进步，而且是比较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更为重要的一大进步。如果没有这个进步，就不会有近代如此高度发展的人类文明，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就会更加长期地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愚昧之中。对于那些为争取实现这一历史进步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前辈，特别是对于我国那些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祖国富强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以恰如其分的肯定和尊重。

这种尊重，实际上也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因为历史辩证法宣告：先进的事物必然要取代落后的事物，新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制度；正如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也必然要取代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辉煌的胜利。只有那些面临灭顶之灾的政治虚弱的没落阶级，才会象害怕光明一样地害怕历史辩证法，而具有远大前程的无产阶级则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把历史辩证法作为自己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用以作为战胜资产阶级的强大精神武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业绩，尽管他们存在着种种局限并且未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要重视工农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但是决不能把这种重视与对于资产阶级曾经起过的革命领导作用的肯定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任意贬低革命领导者的办法来“拔高”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发状态，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提出新的明确的政治纲领，从而使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正规地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如果离开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去为工农群众争什么领导和中心地位，纠缠于什么工农与资产阶级究竟哪个高明，甚至肆意颂扬群众斗争的自发性，那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其次，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历史的本身是极端错综复杂的，决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而必须把他们的全部言论和实践，放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中间，深入地进行考察辨别，然后才能判断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表现了哪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特点，从属于哪个政治营垒，代表哪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历史人物自

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人始终与时代一起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然后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些人从改良派阵营中分化出来，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然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朋友；有些人的道路相当曲折，时而革命，时而反动，时而先进，时而落伍，或以革命为归宿，或以堕落终其身；有些人的变化更是大起大落，或者从革命阵营中的佼佼者蜕变为反动透顶的民族败类，或者从人所不齿的帝制余孽终于醒悟过来，在迟暮的晚年投身于新的革命潮流；……各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的，形形色色的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是客观存在，后世史家可以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剖析品评，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来涂改古人的历史。死者无言。历史人物是不可能为自己申辩的了，然而广大读者却完全有权利向历史学家要求“公道”二字。人民满腔热忱期望历史学家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希望他们以严谨的笔触和犀利的识见，如实地勾勒出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和特写。历史学家决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而且还要充分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人民能够对于历史上的是非正邪善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爱憎。我们的责任是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的规律，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毫无疑问，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一定能够通过历史人物不同的生活道路的对比引出必要而有益的结论。

应该承认，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定是非”？当年林则徐谪戍新疆时的沉郁喟叹，一个多世纪以来曾经扣动了多少文人骚客的心弦！但是，任何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学问家都不可能提供正确的回答，因为阶级的偏见模糊了他们的眼睛。只有眼光远大胸怀广阔的无产阶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

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制作的“崇洋媚外”帽子满天飞，使得人们不仅讳言今天的国外援助，而且也讳言历史上的国外援助。时间早已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竟然出现过某种程度笼统排外的倾向：凡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是侵略分子；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别有用心，仿佛革命越孤立就越单纯越好。这样的看法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历史的事实是，由于好几个世纪以来外国资产阶级的“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世界到二十世纪初年早已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都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都必然要与某些外国政府、政党和个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给以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不能采取回避态度，更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简单做法。

辛亥革命就不是在一国之内孤立进行的，它不仅得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有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支援，甚至还建立过亚洲和亲会之类带国际性的反帝团体。当然，对于这些事情，评价并非很难。比较复杂的是欧美和日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界和民间的人士，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辛亥革命。过去，人们担心惹起麻烦的，多半是对于这些事情的评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已讲得很清楚，不仅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同他们

的政府区别开来，而且还要把这些政府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同决定政策的人们区别开来。至于一个人的国籍，决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进步或反动，更不能说明他的活动对于中国革命的促进或破坏，关键是要认真考察他的主要社会实践及其产生的主要效果。

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或政界中的上层人士，也要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侧重点当然是揭露他们的侵略政策与反动本质，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些人中间客观存在的差别。因为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往往是瞬息万变；统治阶级不会始终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可能出现若干有识之士主张或采取比较明智的政策。对于这些人，当然首先需要分析其阶级实质和政治意图，但也有必要过细地研究他们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交往，适当肯定其积极作用，不宜与那些极端反动分子混为一谈。

总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甚多。上面仅仅概略地谈到其中三个问题，目的无非是强调首先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强调党性的，它必然要在全部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中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但是这种党性又是建立在对于大量客观历史事实进行切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决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需要经常想起恩格斯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显然，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充分占有可靠的资料，运用辩证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

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途径潜心进行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全部总和”与“有机联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揭示客观存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当然，这决非短时间所能奏效，需要多年勤奋而严肃的科学工作，侥幸取胜的“捷径”是不存在的。

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有关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如果单纯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也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现状来说，当前特别要提倡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缺少出版一部全面的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的必要基础。必须首先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中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然后才有可能“从事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辛亥革命史，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写出“证据确凿”和“胜于雄辩”的史学名著来。

辛亥革命史研究还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提倡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通过相互辩驳、相互校正、相互补益，来发展正确的东西，改正错误的东西，深化对历史事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胆略和勇气。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极为丰富，研究课题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我们应该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新领域，发掘新资料，研究新课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开辟研究工作的新天地。在研究方法、论述风格、文章体裁以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也应该鼓励发挥各家所长，形成多种多样的家法和路数，

促使史学园地真正出现一个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有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才能使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学术做出更多的贡献。

辛 亥 革 命

吴 玉 章

一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说，都是导向这次革命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侵入中国的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必须经过严重的社会改革，使自己资本主义化，才能同它相对抗。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曾经认为这种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来完成。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国枪炮武装军队和办几个工厂以外，拒绝在政治上进行任何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就是清朝政府中当权的顽固派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决的表示。如果当时清朝政府在抵御外侮方面是坚决的，那末，拥护它的人也许要多一